

なその役割、マクロとミクロの研究分担をより深め、以上の課題あるいは仮説を検証しながら、現代中国学の構築に取り組んできたわけですが、この仕事は今後核心に入って参ります。「研究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その方向」を具体化して行きたいと思えます。どうも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司会— 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中国文化とアジ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主査の張琢先生からご報告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基調報告③◆

「中国文化とアジア世界の文化共生」研究会報告

張 琢

<愛知大学>

大家好！谢谢大家参加我们的研讨会，希望大家对我关于中国文化与亚洲世界文化的共生，也就是我们简称“文化组”的总结报告提出宝贵意见。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惠泽四方，对亚洲邻国的影响尤其深远，中古以来，甚至远播欧洲。亚洲各国既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亦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吸取了中国和西方文化，加以融合，各具特色。当今的全球化过程，在文化上，则是表现在各民族文化的勃兴与全球普世式文化的互动中的俱进。这是作为全世界人口最集中、历史悠久而又处在经济、文化全面复兴、高涨中的亚洲文化共存共荣、日益频繁交流的时代的文化现象。研究这种背景下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本研究会创办及活动的主旨。本研究会的活动方面很多，我着重介绍几次国际研讨会的情况。本研究会的活动方式以召开大型国际研讨会为主，小型研讨会为辅，迄今已经召开三次大型研讨会，十九次小型研讨会，今天召开的是第四次大型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成员主要有日本学者、中国学者、韩国学者、美国学者等。同时我们还以聘请外国学者来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讲学的方式把研究成果传授给在校学习的博士生、硕士生和大学生。

下面回顾一下这三次大型研讨会的讨论内容，还有一些学术报告，请有兴趣的看论文集。一，第一次国际讨论会，这是2003年11月份在名古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新启蒙、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现代化论及后现代问题。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的路线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同时带动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化，或先或后、或显或隐地体现在政治生活和政治观念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和主张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1990年代末以来围绕着“中国在经济上引进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是否也需要在政治上引进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这一命题，在各种场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我们这次研讨会所以要以这个为主题，会上首先由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政治影响》为题做了基调报告，他指出，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贫富分化、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腐败与社会不公问题的凸现，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三种不同思想价值取向。第一种为知识分子中新右翼的观

点，认为改革中出现的上述种种消极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只要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会逐渐化解，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高于一切，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中间派，认为只有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加强多元社会对权力的监督，以民主来制衡腐败与两局化，改变权力的垄断地位才是根本的出路。第三种观点，也就是新左派，他们以西方左翼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为基础，所以这种新左派并不是有些人表面看的以为是中国的本土的，当然是中国人，但是往往很多代表性的人物是留学西方以后，回国以后，带着这种观点回来的，以平等、以公平为核心价值，把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社会失范与社会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体现，并以平等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选择。萧功秦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论争的三种前景做了预测，第一种前景是民主化条件下的思想多元化，第二种前景是激进新左派与现代化过程中受损的下层绝望阶层相结合，发动一场反对所谓“邪恶富人”的运动，以求在中国土地上重新建立一个理想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公平世界。第三种可能的前景是民粹主义民主与权威主义的两极振荡，陷于拉美化的政治陷阱，最后他强调，中国虽然充满矛盾，但经济态势基本良好，出现现代化断裂的可能性不大，发生后两种趋势的概率并不高。

接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以《老革命的新觉醒》为题，对以《炎黄春秋》〈这是一个杂志〉为园地的中共党内的老革命家、理论家中的民主派的思想 and 政治动向做了介绍。她分析说该杂志的不少作者曾长期担任中央或地方领导，是中国政治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他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追随共产党，长期以来习惯以党的利益为重，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专制主义的影响，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先有个人的自主意识、文革的浩劫和共产党的屡次失误使他们经历了信仰的动摇、彷徨和重新找回自我，现在再度举起他们早年追求而又一度失落的民主旗帜，力求从体制内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些人是共产党的舞台派而非拆台派，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是在中国自由主义尚无立足根底的情况下，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这些人里面有些人这两年已经去世了，象李振声，原来社科院的副院长，有些比如说朱厚泽、李锐、于光远，这些老理论家，他们还在那里坚持不懈地做宣传，台湾大学叶启政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文化、政治与经济搓揉下的中国现代化》，他认为就世界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与19世纪的满清中国一样，当代中国推动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对18世纪以来的西方启蒙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应，仍然是在既有的传统文化模式的支撑下进行的，相对于西方现代化开始于资产阶级借“平等自由”的口号向既有的主导政治势力争取公平正义，现代的中国现代化基本上是始于政治与经济势力的大结合，更恰当地说是政治渗透经济，把后者纳入其既有的运作理路之中，显然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格中内涵着古典主义的思想成分，它势必促使未来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问题，而这又是贯彻公平正义所必须考虑的基础。

美国夏威夷大学周晓副教授在以《与国家的妥协——新自由主义和新左翼》为题的发言中，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左翼和右翼均主动致力于把自己和历来作为国家附庸或批评者的中国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拼命与之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双方特别是左翼又不得不作为国家的批评者而行动，她认为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曾影响并重构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已经使得朝向旧左翼的复归变得困难，但是她担心新左翼人士大多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新左翼的影响，正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最大的威胁，或许会从根本上弱化市场经济至自由主义至自由的基础。神田外国语大学兴梠一郎教授以《如何面对中国的现实》为题，对自由主义及新左翼论争的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并不光是学术论争，它的背景是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的复杂现实，自由主义者认为共产党一党专制是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主张建立宪政，实现言论与结社自由，实施多党制，保护私有财产，新左派则对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同时带有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前者的共同点是对腐败和贫富差距，两者共同点是对腐

败和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正的愤怒，对何为原因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由主义者在一党专制中找原因，新左派则归因于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自由主义明确提出以实现宪政为目标，新左派除了批判资本主义以外，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兴梠一郎教授明确指出目前妨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是政治，不解决经济自由、政治专制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很难持续发展。

神戸大学绪形康教授以《当代中国的公正与正义》为题，按时间顺序梳理了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线索，将这场论战分为1994年以后、1997年以后和1999年之后三个阶段，这种论战现在还在继续，明天我可能也还要讲到。爱知大学周星教授以《华北、全球化与文化自觉》为题，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境遇和动向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国内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动向，分析这些动向，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复杂性，截止目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依然面临着如何确立和提升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民意识这一基本问题，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文化自觉，将是中国今后很长一个时间内都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这个可能是精英理论。

第二次国际讨论会是在2004年10月举行的，会议的主题是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理解现代中国，这是国民统和与文化多样性。这次研讨会的主旨是着重从民族与文化的角度出发，去尝试接近和理解现代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趋向，聚焦于关注国民文化的建构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研究员以《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看当代中国的民族关系》为题作了基报告，他指出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帝国或所有的世界体制大多是在追求统一一致，都在致力于排斥异己和多样性，这样的历史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现在人类开始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有利于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文化多样性也能够维持世界的和平，基于这种认识，中国政府在开发西部以改变少数民族落后面貌的同时也制定各种政策、方法，想方设法保护西部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尽管如此，在城市经济所推动的地区之间、族际之间，就是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很多传统因素会在这种互动中发生变质、变异甚至流失，目前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流失的状况加剧。第二，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兴盛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人为的旅游设施建设对自然景观的破坏，服务行业和游客造成的环境污染，文化项目开发中存在的猎奇取向，就是找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都对少数民族关系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三，族际互动交流中的文化适应与摩擦，特别是随着少数民族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在逐步摆脱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不断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相应地也增强了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在城市生活和汉族群体越来越多地接触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的过程中，某些传媒报道、文学描写、影视作品和生活接触中也存在猎奇、想象、曲解甚至出现侮辱性的成分，由此引起的少数民族群体、地区性反映明显增多。第四，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性取向问题，在汉族集聚地区区域性资源性文化资源的开发强化了维护文化边界的观念，在少数民族集聚地区，民族文化资源的维护强化着族群边界的意识，这两种取向在现代化文化整合的大背景下也表现出分化的特点，这种文化认同的地方性和族群特点一方面无法抗拒相互吸引、相互影响的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又在努力维护和塑造地方和族群的文化特征，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现代化发展所出现的矛盾现象，郝时远认为中国当代的民族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促进互动、日益密切和广泛的时期，民族关系所涉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内容，也更加具体化和富有多样性，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中华民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整合时期，但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适应方面的问题包括民族问题也会继续增多，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靠同质化的生活方式，而是要通过强化文化多样性的

观念来消弥矛盾,承认文化差异的目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强调各个文化类型的天然多样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几位发言及这次研讨会的,我就不一个个的去念了。

简单的第三次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主题是“国家、宗教与文化”,探讨中国的宗教现象、梳理中国的宗教理论与方法是召开这次会议的主旨,会议由爱知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有来自日本、中国、韩国和美国的学者,报告内容大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宗教史、宗教文化及思想史的报告,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宗教现象。二是关于宗教特点、民俗宗教和宗教政策的研究,主要揭示现代中国各种宗教的基本特征以及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民俗宗教的属性,进而探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国家宗教政策所存在的问题。三是对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视角与方法的考察,集中讨论了如何理解中国人宗教生活的整体性以及研究中国宗教现象的方法的问题。时间关系,不好讲得具体了。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极为广泛的概念,与本研究会爱知大学校内的主要成员、所邀请的专家都是从事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和宗教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所以,本研究会学术报告的题目也是做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如前所述,一方面,本研究会讨论的内容已相当广泛,另一方面又有许多重要的学术文化领域尚未涉及到,如何兼顾点与面的关系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司会— それでは、続きましては「現代中国政治とアジア世界平和構築」研究会主査の加々美先生からご報告をお願いします。

◆基調報告④◆

「現代中国政治とアジア世界平和構築」研究会報告 調和と矛盾——中国の内外政治とその枠組み——

加々美光行
〈愛知大学〉

●加々美— 2つの研究会の責任者をしているものですから、再三にわたって登壇します。これは政治研究会です。具体的な研究会の名前は「現代中国政治とアジア世界平和構築」という課題で4年半ほどやってきました。

同じように3回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かつ中間で数多くの小規模な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もおこなってきました。方法論研究会も政治研究会もほぼメンバーが変わらずに4年半、研究会を続けてきました。

第1回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で出された問題が、現在まで引き継がれているという側面。それから徐々に新しい問題が出てきた部分というものもあります。順番を追って最初にどのような問題が出されたかをお話しします。